

本位主义：陆荣廷老桂系集团的本质特征

郑维宽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以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是民国前期在中国南方具有重要影响的军政集团，其核心人物多为绿林出身，并以绿林义气、会党忠诚和姻亲乡党关系为基础建构起权力体系。他们没有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洗礼，但是又参与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全过程，在旧传统与新变局交织形成的复杂政治生态中，不断调整着自身的应对策略，从而获取本集团最大的利益。集团利益第一的本位主义取向，是贯穿老桂系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因此陆荣廷对广西治理和建设的贡献与老桂系集团在广东的巧取豪夺并不矛盾，陆荣廷对地盘的控制意识与他对北洋军阀和革命者反复无常的态度并行不悖。表面上看老桂系集团的行为非常复杂，实际上一切都是为了本集团的生存和发展。陆荣廷的善变固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然而更是民国前期中央与地方复杂博弈的产物，他只不过是民国前期成功实现了自身集团利益的一个典型代表。当时代大势不再向他提供纵横捭阖的空间时，老桂系集团的败亡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陆荣廷；老桂系集团；本位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434X(2022)01-0020-08

作为民国前期广西的统治者，陆荣廷老桂系集团的发迹史紧密联系着清末广西乱局、民国肇造和北洋军阀的统治。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导致的乱世是陆荣廷老桂系集团赖以崛起的时代背景。陆荣廷在清朝末年依靠镇压绿林、游勇、会党武装起家，当上了晚清政府在广西的军事长官。在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中，他审时度势，摇身变为民国广西军政府的副都督，并进而打着“桂人治桂”的旗号，排挤外省势力，成为广西的军政首脑，标志着老桂系集团的形成。民国前期，经历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政坛纷扰，地方军阀

各自称雄，陆荣廷也走上了紧紧依托老桂系集团，建立对广西实际统治的道路。陆荣廷老桂系集团的崛起，不仅是乱世提供的机会，而且与其实行广西本位主义的政策密切相关。有关陆荣廷及其老桂系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荣廷个人(包括生平、交往与政治功过)与旧桂系集团的性质、特点及其统治两大方面。关于陆荣廷个人的研究经历了从早期负面评价较多到如今倾向多元、动态特别是正面评价的转变，比如黄卷超^[1]、周中坚^[2]就主要论述了陆荣廷治理广西及对广西近代化的贡献。在旧桂系集团研究方面，高红霞从来源、扩张意识、独立自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以来左右江流域的政治空间塑造与地域社会变迁”(20XZS022)。

性、多变性、温和治桂五个方面论证了旧桂系集团的特点^[3]，而黄宗炎则主要论证了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功过^[4]，此外还有旧桂系促进边疆民族经济融合、维护边疆安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上述研究成果对陆荣廷及老桂系集团的评价多局限于其中某一方面，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正面评价。究竟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在民国前期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军政集团，不仅涉及其历史定位，而且事关对民国前期广西在中国地位的评价。下面笔者试从本位主义的视角，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对陆荣廷老桂系集团的本质进行剖析，力图复原其本来面目。

一、陆荣廷老桂系本位主义 集团的形成

本文所谓“本位主义”，是指以某人为核心，以长期经营的本土土地盘为根基，以地缘、亲缘纽带结成联系紧密的军政集团，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与各方势力周旋，从而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陆荣廷老桂系集团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894年接受苏元春招抚时成立的健字前营，其中陆荣廷任管带，何四为帮带，谭浩明、韦荣昌、莫荣新等为哨长。健字前营成为老桂系集团的最初班底。随后陆荣廷被清政府派往广西各地剿灭绿林、游勇、会党武装，因为陆荣廷本身就是绿林出身，非常熟悉绿林、游勇、会党武装的活动规律，因此“剿匪”成绩显赫，其职位也不断升迁。1902年升任健字营统领，1904年任“荣字营”统领，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军队，标志着陆荣廷所率军队已经成为广西清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荣字营下辖10营，共4000余人。陈炳锟主持营务处，谭浩明、林俊廷、韦荣昌、黄培桂、黄榜标、蒙仁潜等分别担任各营督带、管带或哨官。荣字营不仅成为陆荣廷建立老桂系集团的基本队伍，而且初步奠定了其干部基础。此后，陆荣廷凭借这支队伍，在镇压会党起义的过程中继续升官晋爵，先后担任参将、右江镇总兵、左江镇总兵、广西提督。随着职务的升迁，其统辖的部队也越来越多，陆荣廷担任广西提督后，全省旧军32营均归其节制^[5]。

如果说此时陆荣廷集团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的话，那么随着民国肇造，陆荣廷接替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广西都督后，则将广西军政大权掌握于一身。在陆荣廷的都督府中，所辖五司二局，其长官多为陆荣廷的心腹干将，虽然也分给革命党人一些职位，但是多为次要部门，要害实权部门都掌握在陆荣廷集团手中，比如陈炳锟任军政司司长、陈树勋任民政司司长、唐钟元任教育司司长^[6]。同盟会员严端、张仁普、卢汝翼则分别担任财政司司长、司法司司长、法制局局长。有论者认为广西都督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荣廷“不论新旧”“毋分党派”的用人初衷，使新政权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7]。这一论调显然过于乐观，因为随着羽翼的丰满，陆荣廷走上了排斥异己、集权专制的道路，1913年陆荣廷将严端、张仁普解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陆荣廷封建意识浓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热衷于将一批旧士绅网罗在身边，组成所谓的智囊班子，为其出谋划策，形成对他的依附，这些人包括陈树勋、崔肇林、唐钟元、韦锦恩、李开侁、苏绍章、林绍斐、李书城、陈继祖等。

民国前期，广西的军政官员多为老桂系集团上层人物的同乡和亲属，其中又以陆荣廷的武鸣老乡、谭浩明的龙州老乡、陈炳锟的马平（今柳州市柳江区）老乡和莫荣新的桂平老乡居多。据统计，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广西70多个县中，武鸣籍的县长占1/3以上，其次为龙州、马平和桂平籍，当时有“非龙即马，不平则鸣”的民谣^[8]。从1913年4月陆荣廷整编广西全省军队后的人事任命看，除了刘古香、秦步衢，基本上都是陆荣廷的袍泽故旧，他们分别驻防广西各地，比如陈炳锟驻防桂林，谭浩明驻防龙州、南宁，黄榜标驻防梧州，韦荣昌驻防上思、太平（今崇左），林俊廷驻防南丹，龙觐光驻防百色，宋安枢驻防郁林，陈朝政驻防庆远，黄培桂驻防平乐。但是很快借拥护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机，陆荣廷杀害革命党人刘古香，逼走刘震寰，将军事大权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中。各部将领都是陆氏的结拜兄弟、亲属、心腹、乡亲等，完全听从陆氏的命令。在老桂系集团内部，通过绿林侠义、会党忠诚、血缘

姻亲关系和地缘关系,结成比较牢固的权力结构和体系,有利于陆荣廷通过老桂系集团实现对广西的军政控制。

二、立足广西本土并开拓周边势力范围的发展策略

(一)对广西本土的经营

对广西本土的大力经营,是陆荣廷老桂系集团本位主义的集中体现。在辛亥革命中,陆荣廷提出“桂人治桂”的口号,逼走广西都督、湖南人沈秉堃和副都督、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人王芝祥,摇身一变,由清朝的广西提督变成民国广西省的军政首脑。他迎合当时的革命浪潮,把自己打扮成为推翻满清而奋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声称:“独立以后,官民同是革命,不可谓首倡者为革命,响应者非革命也。果是热心爱国,护持同胞,即使同盟在前,亦不可尚存党见,自隘范围。廷革命数十年矣,其隐忍蜷伏于满政府之下者,恃有兵权以待今日耳。”^[9]在掌握广西军政大权后,陆荣廷很快就撕下假革命的伪装,为了将广西打造为自己的天下,积极纠合派系势力,对革命党民主派采取两面手法:对能收买者则示以恩惠,给予高官厚禄笼络之;对那些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党人,或者拒不接受收编的民军队伍,则实行武力镇压。

陆荣廷为了确保对广西的统治,也注意对广西民众采取怀柔的手段,通过安抚人心争取民众的支持,而不是一味地高压。据卓锦湖在《陆荣廷琐事拾零》中的口述,陆荣廷任广西都督兼民政长时,新任命的县知事赴任前,都要到都督府禀见请训,陆荣廷也一定亲自接见。他先以和蔼的态度询问新任知县的家庭情况,然后教导说,县官是父母官,既然做了父母官,就要以父母抚爱子女的心肠对待老百姓,切不可欺凌百姓、敲诈百姓,要做一个值得百姓送万民伞的好官^[10]。陆荣廷的这种手段,与阎锡山在山西的做法如出一辙。陆荣廷深知广西是他的根本,具有改善民生、发展广西的朴素愿望,社会底层出身使他在治理广西的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亲民的手段,曾有报纸这样评价他:“其治桂初政,颇崇

廉洁而尚温和,驭将有恩,待下以礼。其遇一般民众,尤无达官贵人骄居之恶习。其公出也,往往步行,不乘舆马,不携从。百工负贩,田夫野老,皆得近之。”^[11]

陆荣廷注意包装自己,一方面树立在老桂系集团内部的权威;另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讲义气、念旧情的带头大哥,努力将广西的各种人物笼络在自己周围,服务于其经营广西的目的。在老桂系上层成员中,有所谓“三帅”之称,即老帅陆荣廷、联帅谭浩明、大帅陈炳锟,而陆荣廷是其中的核心。陆荣廷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深受绿林义气的影响,对岑春煊、苏元春、刘永福、程武英等老上司,以及袍泽故旧、亲戚朋友和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都懂得知恩图报。陆荣廷虽然出身绿林,早年未接受教育,但他知道治理地方需要人才,而培养人才首重教育。于是他大力创办各级各类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军事教育和成人识字教育。他还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据不完全统计,1912—1921年,广西共选派出国留学生155人,其中留日学生117人、留美18人、留欧20人^[12]。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著名农学家盘珠祁、教育家雷沛鸿、法学家苏希润等。

陆荣廷还注意借用外力来提升自己和老桂系集团的形象,他对梁启超的敬重和利用就较为典型。梁启超是清末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民国建立后又投身民主共和运动,加上文笔出众,是当时中国颇负盛誉的政治人物。陆荣廷在决定参加讨袁护国的过程中,决定利用梁启超的声望,邀请梁启超到广西商讨大计,提升自身和老桂系集团的影响力,反映出陆荣廷刻意包装营销自己的算计。为了达到轰动效果,陆荣廷甚至根据梁启超到达广西的时间决定宣布广西独立的时间:“早上到,他晚上发表;晚上到,他早上发表。”^[13]后来梁启超撰写《陆荣廷再造民国的功勋》一文,无疑使陆荣廷加分不少。上述手段,成为陆荣廷牢固统治广西十余年的重要原因。

(二)联合云南、东向广东的发展策略

在陆荣廷老桂系势力的发展过程中,立足广西

是其本位主义政策的具体反映。但是广西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关系非常微妙；二是广西所处的周边环境较为复杂。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眼中，陆荣廷的老桂系势力无疑是既要利用、又需防范的对象。当陆荣廷有利用价值时，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会给他一些好处；反之，陆荣廷则是需要防范甚至被剪除的目标。陆荣廷当然也深谙其道，于是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保持若即若离、虚与委蛇的关系。陆荣廷深知，仅仅依靠广西自身的力量，难以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政府相抗衡。出于维护老桂系集团生存和自保的需要，考虑到云南的情况与广西相似，而且互相毗邻，在广西面临来自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权的威胁时，陆荣廷常与云南结成联盟。而云南作为民国前期的一个革命策源地，也需要广西的配合响应，因此广西与云南的关系可谓各取所需，这一点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后的合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袁世凯破坏共和、称帝改元后，云南率先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并希望得到广西的响应和支持，为此陆荣廷派遣曾彦到昆明与唐继尧商谈广西起义的事^[14]。此前的“二次革命”中陆荣廷之所以没有支持革命党，主要是因为看到革命军的胜算太小，不愿冒丢失自身既得利益的风险。袁世凯打败南方的革命党、掌握大权后，对陆荣廷采取拉拢与防范的两手策略，陆荣廷也深知自身的处境，对袁世凯虚与委蛇，努力维持自己的地盘和力量。当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后，陆荣廷便决定脱离袁世凯阵营，打出“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旗帜，并寻求与云南联手，增强对抗袁世凯的力量。在袁世凯命令龙觐光借道广西进攻云南时，陆荣廷命令老桂系部队在百色收缴了龙觐光部的枪械，然后在南宁宣布广西独立，与云南站在一起。不仅如此，陆荣廷还通过曾彦向唐继尧传达了将南方各省联合起来的打算，以壮大对抗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力量，陆荣廷认为：“要是能够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打成一片，形势就会改观。”^[15]

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军阀实行独裁统治，1917年

孙中山为此发动了护法战争。孙中山的主要依靠力量就是包括广西、云南在内的西南军阀势力。护法战争结束后，陆荣廷与云南军阀唐继尧继续联合，在北洋政府里争取担任重要职位，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1920年冬，陆荣廷曾对云南军阀唐继尧派来的代表说：“我与岑西林（即岑春煊）俱已年老了，无用了，董卿（即唐继尧）年轻，可以希望做到副总统。不过，你们应劝他好好干，要对得住我。不然的话，莫怪我也对他不起咧！”^[16]

同时也要看到，陆荣廷并非消极地守成。当形势有利时，他也具有将老桂系势力扩展出去的野心，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他已经对广西实现了牢固的控制。在陆荣廷的外向型发展中，广东无疑是首要目标，这是由两广之间的历史联系和护国战争中老桂系势力的上升决定的。袁世凯统治时期，广东的龙济光势力对广西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在南方各省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行动中，陆荣廷站在了革命者的一边。随着护国战争的胜利，老桂系集团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陆荣廷本人也赢得“再造民国”的崇高声誉。陆荣廷乘机把势力扩展到广东，武力迫使广东督军龙济光下野，先后由陆荣廷手下的陈炳锟、莫荣新等担任督军，而陆荣廷本人则担任两广巡阅使，这是陆荣廷老桂系集团势力发展的顶点。有论者指出老桂系势力扩展到广东，是讨袁护国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形势造成的，不是陆荣廷有意扩展地盘的结果，并认为广东督军龙济光搞假独立，严重阻碍讨袁护国战争的开展，才是陆荣廷出兵广东的关键原因。上述论者为此对老桂系军队进入广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如果不这样做，“护国运动的进展和成果将受到严重影响，广东将出现更加动荡混乱的局面，北洋军阀将乘机夺取和控制广东，后来孙中山也就不能到广东发动护法运动”^[17]。这一观点明显言过其实了，完全忽略了陆荣廷内心的真实想法和老桂系集团的野心，似乎老桂系是很进步、很革命的一支力量。事实上，民国初期广西财政的困难、历史上两广之间的紧密联系、护国运动中出现的有利机遇，都激发了老桂系向广东扩展势力范围的野心。如果以陆荣廷为代

表的老桂系势力真有那么先进,那么如何理解老桂系治粤期间的种种弊政呢?老桂系势力统治广东5年,只知道贪污搜刮,营私舞弊,排除异己,争权夺利,导致人心尽失。1920年8月12日,粤军在讨伐桂军誓师大会上的宣言中说道:“我粤自莫荣新等窃踞以来,残害吾民,无所不至。举凡民意所属望之事,民意归附之人,莫不被其破坏之,杀害之,驱逐之。番摊义会,流毒最烈,年中因而丧命倾家、卖妻鬻子者,以数万计。鸦片烟勒种遍地,乡人求免,反遭其祸。……广雅图书,乃吾粤文化之命脉,劫掠殆尽。……造币厂所出毫洋,概运回桂,以致吾粤银根短绌,毫币低落,粤人损失年逾千万。”^[18]导致广东民众“视桂匪之在粤,比虎疫蝮蛇之近在盘匜枕席间尤甚”^[19]。最后在粤军的进攻下,老桂系军队从广东败退回广西,而老桂系集团也逐渐走上了末路。

三、维护老桂系集团本位利益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从陆荣廷一生的几次重大选择看,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这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对于陆荣廷来说,是否革命并不是其做出政治选择的标准,只有本集团的生存才是唯一重要的选项。于是我们发现,当形势发生变化时,陆荣廷对革命党人的态度也迥然相异。当革命形势有利时,他便投机革命;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他便背叛革命。高红霞也认为:“对桂系而言,集团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主义问题是第二位的,这决定了桂系在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常常变幻莫测。从护国运动到护法运动,桂系势力由弱至强达到顶峰,陆在政治、军事上的进退始终围绕着集团利益这根轴心,而在主义、信仰方面则时有变化。”^[20]事实上陆荣廷眼中只有集团利益,而无任何主义和信仰。

(一)根据集团利益不断调整应对策略

在民国初期复杂的政治生态中,陆荣廷力图在纷繁复杂的时局中做出最符合本集团利益的判断,争取驾驭时局而不是为时局所裹挟。民国初年,他对革命党人比较敬重,这与当时革命形势的高涨密

切相关。在宋教仁遇刺后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中,陆荣廷选择投靠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和民军大开杀戒,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铲除革命党人在广西的影响,以便树立自己在广西的权威;二是借以讨好袁世凯,以保全自己在广西的地位。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爆发后,陆荣廷权衡利弊,决定追随云南的脚步反对袁世凯,与革命党实现合作,成功后不仅捞足了政治资本,而且将老桂系的势力扩展到广东。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控制北京政府后,扬言要武力统一中国,老桂系在两广地区的地盘面临威胁,这是陆荣廷绝对不能接受的。刚好孙中山决定发起捍卫共和的护法斗争,需要借助于南方实力派的力量,这样老桂系就与孙中山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段祺瑞的威胁。实际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只是老桂系维护自身利益不得已的选择^[21]。一方面,陆荣廷需要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与孙中山及其护法军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妥协与合作;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存在斗争目标上的矛盾,孙中山的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而陆荣廷只是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此外,陆荣廷还担心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削弱老桂系对两广地区的控制。上述矛盾决定了老桂系在护法战争中目标的有限性和实用性,以及斗争方式的妥协性。因此,当陆荣廷觉得孙中山已经成为实现自身目标的阻碍因素时,排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老桂系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进步性,陷入了封建守旧军阀集团的泥沼。最后在革命党掌控的粤军的反击下,老桂系军事集团土崩瓦解,失去了对两广的统治。由此可见,在陆荣廷那里,是否“革命”,完全取决于对老桂系集团是否有利。

(二)在“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的拥袁与讨袁

陆荣廷精于算计和投机,他一生的用心,就是在乱世中抱持基于广西本位的实用主义立场,为老桂系集团谋取最大的利益。辛亥革命后,他投机革命,攫取了广西军政大权,形成了独据一方的封建政治军事集团。他从“革命”中获得了好处,但却并不感恩,对那些拒绝接受改编的民军队伍和革命党

人采取了武力消灭的手段。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人宋教仁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孙中山曾派人联络陆荣廷，希望他参加举事，但陆荣廷权衡利弊后，认为革命党胜算不大，于是倒向袁世凯。不仅如此，他还充当袁世凯在广西镇压革命党人的帮凶，杀害了辛亥革命元勋蒋翊武、刘古香等一批革命党人，还指使、纵容手下大肆镇压各地的民军，使广西的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当然，陆荣廷也从投靠袁世凯中获得了好处，袁世凯对其加官晋爵，授予陆氏“耀武上将军”称号。

但是陆荣廷毕竟不是袁世凯的心腹，很难获得袁世凯的真正信任，于是袁世凯对陆荣廷采取了既利用又防范削弱的两面手法。因此，陆荣廷与袁世凯之间只是相互利用的利害关系。陆荣廷对于袁世凯的价值，就在于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而且广西夹在西面的云南、贵州和东面的广东之间，袁世凯拉拢陆荣廷，就可以使两广连成一体，共同钳制云贵，解除云贵对袁氏的威胁。同时，为了防范削弱陆荣廷，袁世凯派遣心腹王祖同到广西担任巡按使，对陆荣廷进行制衡。王祖同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龙州等地安插密探暗哨，监视陆荣廷的一举一动。此外，袁世凯将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勋作为人质，后又将其毒死，增添了陆氏对袁世凯的仇恨。加上陆氏的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启超的策动^[22]，以及陆氏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国际上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多抱不支持态度，使陆氏逐渐下定了反对袁世凯的决心。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云南蔡锷、唐继尧宣布起义，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一方面调派北洋军进攻云南，另一方面下令陆荣廷率部攻滇，但被陆荣廷称病拒绝。此时的陆荣廷知道，云南起义若失败，那么袁世凯的下一个对象就是自己，所以他对身边的人说：“袁氏称帝成功，就是我的失败，或是我重做绿林的下场”^[23]。为了自身的利益，陆荣廷决定举兵讨袁。为此陆荣廷在南宁召集心腹开秘密会议，商议讨伐袁世凯的事宜，他说：“我与袁贼势不两立，主意已定。现你们既已同意，今后就要贯彻讨袁到底，如有中途动摇反悔，不论是我的至

亲、朋友、僚属，我都不惜大义灭亲，一定要给他严重的处理。”并宣誓明志^[24]。但陆氏毕竟是老谋深算之人，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在准备举兵讨伐袁世凯的同时，留下十营精锐留守龙州、南宁、百色三地，作为反袁失败后的依靠力量，甚至做好了到越南重新开始的准备^[25]。在做好上述准备后，陆荣廷驱逐王祖同，将龙观光进攻云南的部队在百色缴械，出兵攻打湖南的汤芗铭和广东的龙济光，使自己的势力空前强大。事后出任两广巡阅使，成为两广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老桂系集团的利益，陆荣廷不惜对亲家龙观光下手，下达了若龙观光顽抗，则可以将其击毙，而且对龙观光的儿子、自己的女婿龙少怡也可以开枪打死，反映出陆残酷无情的一面。他曾经对心腹卓锦湖下令：“如情况对我不利时，你即将龙观光予以袭杀，以免纵敌贻患。”“如果姑少爷和你对阵，你就把他打死，我准备养大小姐一辈子就是了，绝对不要顾虑，你放心去做吧。”^[26]

（三）护法运动时在各种势力间的纵横捭阖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而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挟皖系军阀势力，力图操纵国政，与黎元洪发生矛盾，导致府院之争。另一方面，段祺瑞投靠日本人，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特别是对南方的地方实力派构成了严重威胁。更为严重的是，段祺瑞一心搞专制独裁，并不打算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废除的临时约法，从事实上解构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基础，严重损害了民主共和制的政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决心恢复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针对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发起了“护法运动”。首先在广州成立非常国会，联合南方各省的力量，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等为元帅的护法军政府。但护法军政府内部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陆荣廷等旧军阀排挤孙中山，发起成立所谓的七总裁制，事实上剥夺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从陆荣廷在护法运动中的表现看，呈现出为了维护老桂系集团的利益而极力算计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陆荣廷需要与西南军阀以及革命党合作，但在段祺瑞辞职、冯国璋主政北京政府后，马上又由“联孙护

法”转变为“对冯妥协”，最终为了自身利益与直系军阀妥协停战，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另一方面，为了防范革命党人向两广地区的渗透，巩固两广地盘，陆荣廷的老桂系集团使用各种手段排挤孙中山，并想方设法控制护法军政府。比如在经济上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莫荣新毫无掩饰地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27]在军事上千方百计不让孙中山及其军政府拥有军队。对孙中山派到广东各县招兵的人员，广东督军莫荣新诬陷为土匪而予以枪杀。莫荣新甚至于1918年1月擅自拘捕孙中山的卫队官兵，还枪杀多人。面对莫荣新的挑衅，孙中山下令豫章、同安两艘军舰炮击督军署。虽然莫荣新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不准还击，还亲自向孙中山道歉，但是老桂系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即无论谁影响到老桂系集团的利益，他们都会做出强烈反应。所以当陆荣廷得知消息后，曾对亲信李静诚和盘珠祁说：“孙文呀！满清推倒了，就应出洋去，不应再搅又搅，东捣乱，西捣乱。他竟敢炮击督军署莫日初(即莫荣新)者！如果是我，我一定要还枪，一定要结果他！”^[28]生动地反映出陆荣廷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真实态度。

1918年5月，老桂系在与直系军阀妥协停战后，认为不再需要与孙中山合作，于是集中全力对付孙中山，联合各派操纵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废除大元帅制，设置7位总裁。孙中山仅是其中的一位总裁，处于有职无权的状态，而老桂系则达到了操纵军政府的目的，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终于看透了老桂系的真实面目，指出老桂系集团“是革新之障碍，若不排除而廓清之，则其进步之难，难于填海”^[29]。于是决心先剿灭老桂系的军队，统一南方，在两广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四、结语

出身绿林的陆荣廷，在清末民国前期的乱局中，立足广西，通过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老桂系集

团，以本位主义为宗旨，以实用主义为价值取向，以维护本集团利益为目标，揣时度势，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统治广西十余年，成为民国前期从广西崛起的一个重要军政集团，并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陆荣廷作为老桂系集团的代表，通过不断积累个人声望，成为与北方的袁世凯、东北的张作霖并称的一代枭雄，时人称为“北袁南陆”“南陆北张”。老桂系集团的最初“成功”，主要来源于其采取的立足广西的本位主义策略，因而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老桂系集团不同于粤系、川系军阀的派系林立，湘系军阀的南北摇摆，黔系军阀对滇系军阀的依赖，而是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为了营造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周边环境，老桂系集团还经常与滇系军阀相互配合，共同掌握着对国内政局的一定话语权。正因如此，老桂系集团才具有自主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

老桂系集团具有一定的扩张野心，但是广西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其雄心壮志，军队的扩张和维持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陆荣廷借助讨袁护国战争的胜利捞足了政治资本，成功地将老桂系集团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广东，使老桂系集团发展到顶峰，但是事实证明，老桂系集团没有能力对广东实现有效治理，也不能实现对两广地区的有机整合，最终只能是牺牲广东的发展，以弥补广西财力、物力的不足。

陆荣廷老桂系集团依托广西起家和发展，以广西为其生存的根基，其宗旨就是维持对广西的长期统治，而没有经略全国的抱负。老桂系集团之所以参与民国前期的国内政治和战争，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从陆荣廷一生的几次重大选择看，广西本位主义是其秉持的基本生存之道，是否革命并不是他做出政治选择的标准，只有老桂系集团的生存才是他唯一重要的选项，为此他甚至可以大义灭亲。本位主义充分体现出老桂系集团实质上就是一个乡土性军阀集团，没有革命理想，缺乏后来新桂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雄心壮志。正因如此，当民主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时，老桂系

集团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大势，不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为敌，其抱残守缺的弱点便暴露无遗。

总之，本位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清末民国初年的乱局之中，立足广西本位的实用主义投机行为或许能够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是若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妄图以地方利益阻碍民主革命进程和国家统一大业，陆荣廷老桂系集团注定免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保境安民的地方豪杰，在面对统一势力的“传檄”时往往能够顺势归附，为实现国家统一做出贡献，而那些不谙大势的顽固者最终灰飞烟灭，足以成为民国前期地方军阀的鉴戒。

参考文献

- [1] 黄卷超.试论旧桂系首领陆荣廷执政治桂贡献[J].广西地方志,2007(5):48-52.
- [2] 周中坚.广西近代化进程中的老桂系时期(1912—1924年)[J].东南亚纵横,2008(3):80-87.
- [3] 高红霞.略论旧桂系集团的特点[J].学术论坛,1995(6):86-89.
- [4] 黄宗炎.护国战争与旧桂系的兴亡[J].学术论坛,1988(3):90-94. 旧桂系与护法运动[J].广西党校学报,1988(1):56-62.
- [5] 宣统政纪[M]卷55,宣统三年六月庚午.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公报[Z]第30号“公文”,第74、214、215号“命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 [7] 周长山,刘祥学,宾长初主编.广西通史(第八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698.
- [8] 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二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609.
- [9] 梁廷栋.梧城风鹤记略[A].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130.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桂系纪实[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778.
- [11] 国闻周报[N].民国三十五年(1946)第二十期.
-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广西通志·政府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167.
- [13] 梁启超.陆荣廷再造民国的功勋[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C].1985:38.
-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桂系纪实[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247.
-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桂系纪实[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247.
-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桂系纪实[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841.
- [17] 周长山,刘祥学,宾长初主编.广西通史(第八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731—3732.
- [18] 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4.
- [19]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C].上海:民智书局,1930:339.
- [20] 高红霞.论旧桂系集团的特点[J].学术论坛,1995(2):88.
- [21] 周长山,刘祥学,宾长初主编.广西通史(第八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737.
- [22]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203—204.
- [23] 马毅堂.陆荣廷讨袁的原因[A].老桂系纪实[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236.
- [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78.
- [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桂系纪实[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727.
-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86.
- [27]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J].建国月刊,1927(3):6.
- [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桂系纪实[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841.
- [29]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三册)[C].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683.